

中美关系需要实现四大超越

王帆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对于中美关系而言，要想在未来的岁月中取得突破，关键是能否实现四大超越。

一、超越极化分割。无论是两极还是多极，这仍是国家行为体至上或国家行为体唯一的时代观，仍是权力政治思维的产物，是偏狭的单一层次论的体现。忽视了国际事务多种因素互动的复杂现实，贬低了高于或低于国家的国际组织的积极影响。中美两国应带动国际社会多层次有效合作的进程，并发挥更为主动的作用。

二、超越制度分歧和价值观歧见。不同制度之间的良性竞争将成为长期共存的现实。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发展国家以各自的发展模式实现可持续增长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些成就可能是阶段性的，但仍具有巨大的说服力，即国家以符合自身特性为基础制定发展战略而不是照搬一个模式的改革方向是值得探索的尝试。在当前的金融危机影响下，发达国家自身模式的隐患也使人们相信世界上没有普世的完美的制度，不同制度模式以及不同价值观的共存是符合人类多样化现实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无法也不能复制以往大国的强国之路，不同制度的探索均是对人类发展的贡献。中美两国遵循和而不同的原则就是对人类创造性的尊重。

三、超越地区合作走向全球合作。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合作与交流取得了一些进步，尤其是中

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可谓合作处理热点问题的新典范和新尝试。中国不会谋求中美共治的格局，但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中国会像其他国家一样在更多地区问题上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和平的进程向前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合作是不以地区划分的。

四、超越权力政治限制。权力政治是国际政治的某种现实的反映。制约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瓶颈还是权力政治。权力政治与均势及联盟式政治相连。在这一思维框架下，争斗与冲突无法避免。改变权力政治思维只有中国一方努力是不够的，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增强互信，增信释疑。

总之，美国需要避免两面下注，中国不是美国的赌注，而是美国可以合作的坚定的伙伴；美国需要避免走传统西方式霸权统治的老路，尊重世界“非西方化进程”；中美两国应主张未来的国际秩序是制度主导而不是国家主导，通过建设和完善国际制度来管理国际社会；中美关系中充斥着许多新的议题：能源、环境，反核扩散等等，这些都成为中美关系中新的增长点；中美之间需要确立新型非联盟合作型关系，即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种战略关系必须有共同或相互认同的权利和义务，也需要承担彼此认为对方必须承担的责任。同时需要进一步明确和研究中美关系中共同的行为规范和准则。

未来中美关系：双边调适之道

沈丁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中美关系，讲到底是一个既有超级大国与一个最有希望在较短时期内上升为一个新超级强国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即使重返超级地位，并非

不可思议。在两个世纪前的长时期中，现在中国的前身就是世界超级大国。中国在近代长期沉沦之后再度上升，已是不争事实。再度成为超级强国，也

确具可能：在一个开放的、非殖民的全球化时代，以和平共赢的方式获得自身发展，同时不挑战他方合法利益，甚至为寻求发展机遇而根据力量对比做出策略性妥协，就更有可能争取到持续和平发展的时间与空间。避免谈论中国再度成为超强的可能，无助于化解当代既有强国对中国上升的担忧，更遑论取得大国对此的坦然接受。

中国要取得更为理想的国际竞争地位，需深刻反省自身的不足，不卑不亢地深化现代化的进程，

包括继续学习美国和其他强国的成功之道。其间，中国也许更能体察美国的思想来源和实践范式，并更有能力与美国与整个世界合作，协同处理好广泛的国际事务，并依据自己的理想和能力，制约美国或其他国家未来可能的不履约、非合作行为。同样重要的是中国需要将和平崛起的理念加快付诸实践。惟其如此，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才更具相互尊重和可接受性。

中美关系的双重形势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近几年来，美国政府越来越倾向于从美国的能力和利益出发，在更大的范围和更长远的意义上尝试接受一个现实趋势，即中国和平地兴起为世界主要强国之一。与此相关，它虽然一方面继续对华军事防范，增进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并力图加强对华外交竞争，但另一方面也致力于积极增进和显著拓宽对华协调，更加注重与中国之间的经贸相互依赖关系和有选择的战略合作，并且将这些置于对华政策和整个对外政策议程中的更显要位置。美国政府的这种基本动向与中国成功的对美战略一起，构成中美关系总体上比较好的两个重大原因。

不仅如此，目前美国正处于几十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之中，并且可能面临经济严重萧条的前景，因而争取拥有巨量资产的中国大力参与营救，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重中之重。与此同时，随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五天战争”，美俄之间的情感交恶和战略对立大为加剧，这必然导致华盛顿更难承受搞坏对华关系的代价。鉴于中国对美国的巨大重要性和中国国际态势的高度和平性质，可以预料即使 2009 年 1 月白宫易主后，美国对华态势的某些方面可能有负面变动，但上述大趋势远不可能发生

重大改变。中美关系可以有良好的未来。

然而与此同时，中美两国间的中长期结构性矛盾正在变得比过去更为深刻：中国对美贸易持续巨额出超，愈益成为美国国内强劲的保护主义舆论的主要诟病对象，中国外交和经济影响的广泛扩展和迅速增进，已引起美国所有各派精英的不快、嫉妒和忧惧，中国持续和加速的军力发展已成为美国军事战略家和保守派耿耿于怀的忧心事态，关于经济成功的“集权主义强国”具有体制生命力和模式吸引力的理念正在美国愈益蔓延，中国的迅速发展越来越被认作是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价值观、精神优势和自信心的最大长期挑战。

因此，尚远不能肯定中美两大巨型国家未来必定能够几十年一贯地避免经久对抗甚而重大冲突。与此同时，在中国的自主发展成就震撼美国的自信自傲这一背景下，美国朝野在思想深处将继续反复踌躇和徘徊，从而总的来说增进美国对华态度的波动和复杂性。在中美关系的上述双重形势中谨慎行事，促进协调，控制竞争，避免冲突，乃是中美两国政府和公众的共同责任。
